

# 终结『疑古』下

张国安 著

自序

兩年前，我在努力用新辦刊的讀書雜誌裡發表辯論古史的文章時，懷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時答应了，但是沒有動手。所以，雖然只因裡而有一篇重要的辯論文章，但沒有



人民出版社

# 终结『疑古』下

张国安 著

自序

兩年前，我在努力週刊的讀書雜誌裡發表辯論古史的文字時，懷社同人就囑我編輯成書。由社中出版。我當時答应了，但是沒有動手。所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装帧设计:蔡立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结“疑古”/张国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01-018450-0

I. ①终… II. ①张…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2383 号

## 终结“疑古”

ZHONGJIE YIGU

张国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62.75

字数:787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8450-0 定价:180.00 元(上下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4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下 编



# 探幽索隐 解荒化诞

## ——古史传说时代合理内核的两个重要论例

中国学问尽多精妙之处未曾研究出来。此责在吾辈，然风雨鸡鸣，谁则同声相应耶？

——顾颉刚

### 引 论

笔者在上中编从各种角度检讨了三肇之说的论证，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的诸多不当，结论认为三说只是个人表达的一种意见，至多是一种逻辑的可能性，作为学术结论是不成立的，是学术习作而非“圣经”。但这并不意味传统的古史体系就可以自然而然、没有问题的重新确立，我们仍需进行学理上的充分论证。

史学上的传说时代是什么？传说时代、古史及神话之区分，以前颇不乏人，如顾先生、徐旭生、杜正胜等<sup>1</sup>以神话与古史对立之说影响较大。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些西方史学的进展，以利开阔视野。“困难产生于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一个极端是刻板的学者甚至把希罗多德的‘探询’排除在历史之外，理由是它们不符合史学方法的现代规则；另一个极端则是一些人把整个前希罗多德时代和希腊以外的作品都扩展到历史这一名目下。”“根据熟悉且古老的说法，历史起源于神话并逐渐摆

---

1 参见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台湾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相关内容。

脱了这种神话特性”，“历史和神话”，“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传说（指双胞胎的故事）可以被看作神话和历史之间的纠缠不清互相交织的象征。”<sup>1</sup>而近东文明之初的“神权历史学和神话”可以称之为准历史学，“这种文献所表达的思想虽有似于我们所称为是陈述过去的那种历史学但又与它不同：第一，这些陈述并不是对问题的答案，不是研究的成果，而仅仅是述说作者已经知道的东西；第二，所记录的事迹不是人类的活动，而是神明的活动。”“尽管神权历史学根本不是有关人类活动的历史学，然而就故事中神明人物是人类社会的超人统治者这个意义来说，它仍然与人类活动有关；因此他们的活动就部分地是向人类所做出的、而部分地则是通过人类而做出的活动。在神权历史学中，人类并不是所记载的活动的行动者，却部分地是一种工具，部分地又是一个被动者。而且，这些活动被想象为在时间序列上占有确定的位置，发生在过去的某些日期里；反之，神话则与人类的活动完全无关。人的因素完全被摒除了，故事中的人物仅仅是神。而且所记载的神明活动并不是有日期可稽的过去事件；它们被想象为在过去发生过，不过确实是在遥远得不可考的过去，以至于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它是在我们的一切时间记录之外的，叫做‘万物之始’。因此，当神话被安放在一种看上去似乎是时间的外壳之中的时候，（因为它叙述的事件是按照一定的秩序一个随着一个相继出现的），这个外壳严格地说来并不是时间上的，它是半时间性的：叙述者是在使用时间上相续的语言作为一种隐喻，用以表达叙述者并不想象为是真正时间上的各种关系。因此以时间上相续的语言在神话上所表现的这种题材，就神话本身而言，便是各种神

---

1 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等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4、24 页。

或神性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神话本身总是带有神谱的特性。”“准历史学的这两种形式，即神权历史学和神话，统治了整个近东，直至希腊兴起为止。”<sup>1</sup>

“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希腊人非常清楚地并有意识地不仅认为历史学是（或者可能是）一门科学，而且认为它必须研究人类的活动。希腊的历史学不是传说，而是研究；它在试图对人们认识到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些问题做出明确的答案。它不是神权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所探究的问题并不是神事，而是人事。而且它也不是神话式的。所探究的事件不是万物之初、时间无考的过去的事件；它们是若干年之前、时间上可确定的过去的事件。”<sup>2</sup>叙事前辈之前肯定存在着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只是缺乏史料批判的眼光和手段。“尼布尔渴望揭开诗歌笼罩于历史真实的‘多彩面纱’，但一代以后的人就变得对这种高贵的梦想表示怀疑。”<sup>3</sup>蒙森的罗马早期史探索接续了这种努力。

即使到了“当今，一些学者一直在努力重新联合这些争论的兄弟，断言神话有其历史面目，而历史并不完全像它经常所宣称的那样是真理的推动者。就像神话曾被当作历史一样，现在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神话’。和历史一样，神话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记忆形式，或者一种纪念形式，用来认识过去或体现过去——或者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已逝者的敬意。”<sup>4</sup>

而“某些历史学家，有时候是整代的历史学家，发现某些时

---

1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7页。

2 《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3 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26页。

4 《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25页。

期竟然没有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便称之为黑暗时代。”<sup>1</sup>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存在着很多种神话理论,但就像马丁·尼尔森所评论的,“没有什么文献能像关于神话的众多文献那样如此快地过时。”这通常是怀疑主义的理论基础。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神话恢复到历史条件之下——如何从“遥远过去”的传说背后找回真实。而真正的历史研究“是一个解读、解密和解释的问题。”<sup>2</sup>“历史研究总是在进行自我更新,然而它仍然不可避免地而且适当地受过去的制约。……历史总是存在于观念王国之中,摇摆于真实和假象、确定和可能之间。”<sup>3</sup>而研究主体也存在批评家与怀疑论者的区分,柯林伍德说:“批评家不是怀疑论者;因为一个批评家是一个能够而且乐意为自己接受别人思想的人,为的是要看看别人究竟做得是不是好;而一个怀疑论者却是一个不愿意做这种事的人;因为你不可能使一个人思想,像是你可以让一匹马饮水那样,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向一个怀疑论者来证明某一项思维是健全的,也没理由要为他否认而耿耿于怀。”<sup>4</sup>

上述西方大史家的精彩研究以及评论,对我们理解、研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不乏启示,观照华夏的传说时代。

**1. 为何无人勘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砍去中华文化之源头、否定早期中国历史的“疑古”问题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中国本身特有的经史之学及其密切关系的学术背景所使然,时断时续的“疑古”潜流在东西交汇的大背景下与诸多因素混浑,因缘际会激发出了滔天巨浪。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中西历史对比的背景所使然,这一方面李孝迁先生的《域外汉

1 《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2 《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29、493页。

3 《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3页。

4 《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学与古史辨运动》文有深入的研究。<sup>1</sup> 因为中国传世文献描述的古史传说时代与其他民族的描述（神话或史诗之类）有着相当的不同，她明显缺少一个神话的时代，这是中西学术界都很明显感受得到的，也是在学理上、宏观上否定中国早期历史真实性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不能全面摧毁“疑古思潮”的这些“学术”基础，不在学理上将这些问题阐释清楚，自然就无法祛“疑古”者之疑，“走出疑古”就只能是口号。而要想说清楚讲明白，就不得不全面的重估以往研究的一切方面。

太史公承接《帝系》等文献系统记录了华夏古史的传说时代，但他以经学的雅驯标准排斥了三皇，这实际上已经算是经史混一。衡诸人类同时代的成果，这可谓杰出的成就、理性的光辉，但这也埋下了近代混乱思维之远因。而刘歆继之以综合、缘饰，伪古文增之以少昊，更是将历史加以相当程度的扭曲……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实启泯灭经史差别的旅程。从近代世界史学史的开端到如今，世界学术界竟然没有一位学者对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进行过合理而完满的解释。如果说外国学者因为语文隔阂而未能如愿，那中国学者在东西学术交汇之后何以同样没有做到呢？从康有为、顾颉刚及胡适等掀起的“疑古思潮”倒是给出了一个解释——这些都是编造的谎言，而从王国维、陈寅恪到当今的李学勤诸多先生对此“疑古”及其思潮并不赞成，但只是知其不然而不知其何以不然，具体的回应更是乏力。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现状仍是步履蹒跚、趑趄而进。这在在说明若没有对“疑古”及其“思潮”的学理进行摧毁和根除，对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整体理解就不可能完满地确立，笔者在中编

1 《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笔者深为其搜罗之广、用功之勤所叹服。但李文以此助推三说自然可靠的言外之意却是笔者期期不以为然的。

从各方面谈论的诸多盲点已经相当程度地进行了解释，相信已提出了不少较有价值的问题，并得出了初步的解释。为进一步推进传说时代的研究，在此重新强调一下重点。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之所以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中国学者研究传说时代之所以难以有效推进，是因为近现代学者混淆了经史性质，泯灭了经史之别。清末民国大盛的今文经学，一言以蔽之，是主观之学。民国肇建，学术界普遍认为旧的经学式微乃至衰亡了。但实际上只是研究经书的人寡少了，大家忽略了经学思维未尝须臾离开各阶层的人们，经学的常识思维已经融化于民族的血脉之中，经学虽然不再指导治国了，但却由于经史混一窜入史学领域而成为指导思想，史学中又混入了西方传来的现代常识，现代“疑古派”所谓科学方法和态度与西方的科学史学实际上并没有太多关联，他们是以经学思维腰斩了历史意识，指出一些记载的传说事例不合儒家经义，顾颉刚、丁山两先生的话就非常典型。对于不合常识常情的事例，在中国学界被研究传说时代的学者一笔抹杀，大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处，而不知道这些常识并非传说时代的常识。这也是王国维、陈寅恪、李学勤先生们知“疑古”之不然而不知其所以不然之要害所在，华夏历史遂遭受空前未有之浩劫。经是一套价值系统，史是记录人类活动轨迹的，而且“历史像诗歌和哲学一样，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对起源问题的好奇心，这一起源问题允诺从几个首要原则开始理解——不同的是历史包含人的因素，它把起因和结果相联系，基础和祖先相联系”。<sup>1</sup> 经的形成与商周巨变有关，小邦周一举灭掉大邑商后兴起了历史的反思，到春秋战国最终形成了世俗化的常识思维，经学反映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

---

1 《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第376页。

即“子不语怪力乱神”，对彼岸持一种存疑主义的立场。经学实际上与华夏自身的人类学内容相抵触，从古代到如今的学者普遍缺乏人类学的视野即由此而来，中国学界长期视《山海经》为荒诞不经就是很好的例证，传说时代的研究要想取得长足进展就必须摆脱经学思维（常识思维）。

经学与史学的范畴演变，顾先生的方法仍是经学之法，其态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以往在研究传说时代时，过分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它虽然止住了“疑古思潮”狂飙的进一步泛滥成灾，却把进步的希望让渡给考古学，而考古学又长期无法提供新的可供研究的充足出土文献，以致研究停滞。因此，二重证据法并非有效推进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途径，也没有找到治理传说时代的合适方法与恰如其分批评史料的适当手段。

对于近现代的任何历史研究者来说，保持客观、不存先入之见的态度和适当的研究角度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强调这种态度之重要，是因为一旦没有它，就很容易扭曲历史，我们应该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并不是都能搞清楚、弄明白的，在条件（材料、方法等）不具备时，与其强作解人，不如慎言阙如，否则，即便凿空混沌也不能算科学研究，治历史需如孔子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以及司马迁、褚先生“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学术精神，“科学主义”作为信仰对于历史研究是有害的。例如，美国学者倪德卫对《竹书纪年》的研究就值得注意，他不存先入之见，对许多中国学者弃若敝屣的远古年代的记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他的具体结论，这种客观的态度令人欣赏。顾立雅也认为“‘夏朝的纪年、帝王以及史事，虽然都是传说’，这个朝代‘一定是存在的’。”<sup>1</sup> 强调

1 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1937年，第131页。

研究的角度之重要，是因为研究传说时代存在一些必备的多学科知识，起码必须具有人类学的视野，研究传说时代较有成绩的，中国学术界熟知的学者徐旭生先生是留法的，而在大西北多年的考察就使他具有这一视野。而外国涉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学者也多以与“疑古”合辙的居多，这主要是常识思维在作怪，而拉铁摩尔之所以能对这一时代做出精彩的分析<sup>1</sup>，得出了一些合乎中国历史实际的推论，与他个人有着丰富的人类学阅历和一定的唯物史观素养密切相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大都用中国传说时代的材料说明远古历史的社会发展，之所以较“层累说”更为合理，就是因为这种理论具备了人类学的视野。但因为缺少史料的考辨，因此才被童书业等人讥讽为公式主义。这其中有人既信奉马克思主义又推崇“层累说”，这是不应该的，逻辑清晰的史学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层累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相容的。

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是从审查资料（鉴别真伪、辨明虚实）到确定历史事实，这个步骤用中国传统的术语叫辨伪。

古人有以辨伪卫道、寓经世于辨伪的传统，“权威最高的是经，其次是正史。至于在先秦及两汉诸子书中所保存的古史资料，那是以经和正史为标准定去取的：合于它们的为真，不合于它们的为伪。”<sup>2</sup> 乾嘉朴学提出以古为尚的史料原则，在辨伪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就其理论建构与方法的严密程度来讲，并不完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衡之以西方史学的发展阶段，它大概相当于西方近代前期的博学时代。中西碰撞导致的巨大变迁对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西洋文明输入吾

1 参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二部分《传说时代与早期历史时代》，尤其是第十章《农业的进化与游牧业的反复》值得参考。

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sup>1</sup>西方为我们提供了新理论、新视角、新思路，在史学的鉴别真伪考辨史料方面，西方强调原始资料尤其是目击证据最为可靠的观念强烈影响了中国学人，但由于使用者对这整套方法理解的不深以及缺乏对全局的把握，没有处理好有无原始资料及其与其他各类材料的价值间的关系，以致运用失当，“确解”诚然不少，“误解”尤其繁多，把成书年代（或写定年代）当成历史事实的发生年代就是其中一个严重误区，如“适之论古书于唐、虞、文王、太公，皆以为无其人。谓中国书可信，当以《诗经》所有证之。大约自周宣王起为历史之可信者。《诗经》中称文王及姜源（当为姬）之类，皆可分作神话一派云。”<sup>2</sup>而“层累说”论战“这场辩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引起大家对于审查史料工作的重视，即是顾先生所谓的‘辨伪的工作’。在未用一件史料之先，我们应当先考察这史料的真伪；第二，即是真的史料，我们要问作者的时代或用意。”<sup>3</sup>由之而起的“古史辨”运动和所谓的史学革命却造成了传说时代研究的随心所欲之乱象，尤其是“极端疑古派”“看见了不合他们意见的论证，并不能常常地审慎处理，有不少次悍然决然宣布反对论证的伪造，可是他们的理由是脆弱的，不能成立的。……他们处理史料这样的不审慎，手里又拿着古人好造谣的法宝，所以所至皆破，无坚不摧！可是，破了和摧了以后，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否能够建立，那却太成问题了。”每每“称与我意相合者为真实，斥与己意不合者为作伪”，结果造成“治古史的人一谈到传说的资料，总是左支右绌，不敢放手去工作，就是有些位大胆使用这些资料，却也难得史学界的同意。不同

1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1卷6号。

2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9页。

3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王学典陈峰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意的原因，大多数并不是想纠谬补缺，使资料的处理更为合理，却是从根本上疑惑这些资料的可用与否。”<sup>1</sup>当时不少学者虽有些颇具价值的思考，本书有相对详尽之研究的不再赘述，他如钱穆于30年代中后期在《国史大纲》中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认为“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伪造（以其流传普遍，如舜与禹其人等）”，等等。但这些并未改变混沌的局面。

这说明传统辨伪法既不足用，加上错误的经史混一之大趋势，又未能理解西学中抽象层次更高的概念、理论、典范与历史思维，更是用以今律古、以己度人地非历史主义的方式，以致形成了各说各话的局面。东西学术混杂的实况是思维混乱的结果，复又成为更加混乱的根源。而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乱象，就必须对事关中国传说时代的史料给予正确的认识，并在具体的考辨方法上加以深入探讨，徐旭生先生对此做了最为可贵的努力。

徐先生认为：“对于传说故事，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要在研究中鉴别真实的历史成份，由可靠的线索中理解史事的真相。”并总结出一套考辨史料的方法，最大的贡献在于以科学史学原始资料的原则结合中国传说时代的资料特点，提出传世文献材料的“本质与来源分为两类：一、‘原生的’，包括一切见于早期记载的传闻异说。二、‘再生的’，包括一切见于后期记载之假的、伪托的、孳生的传说故事。这种传说大部发生在东汉以后。其中却非全无‘原生的’传说。归结一点，就是注重史料的原始性、等次性”<sup>2</sup>。后来加以深化，“现在所保存的关于此时代的文献方面的史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专篇的，成系统

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7页。

2 徐旭生、苏秉琦：《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

的，大家看过可以得着一个综括印象的；二为零星散见的，不成系统，有时候不靠前项资料就很难知道把它向哪里安插。”“后一项零金碎玉，为当日贤士大夫随便的称引，本无容心，就有失真，也很寡少。后一项还没有综合，还没有系统化的史料极可宝贵的点正在此处……把后一项零星散漫的史料小心地搜集和整理起来，洗刷掉它那神话的外壳，找出来可信的历史核心。”“需要注意此期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从来治历史的人都注意於史料来源的原始性。如果能得到原始史料，那就比较容易地判断一切，要比逐渐失真，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价值高得多，这也是很明白的道理。”将各种资料分为三等（三期）。“使用的时候是：如果没有特别可靠的理由，不能拿应作参考的资料非议第二、三等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特别可靠的理由，绝不能用第二、三等的资料非议第一等的资料。”<sup>1</sup>这是符合西方史学关于史料考辨的原则的，“只有在直接接触原始资料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才有可能与被阅读对象直接结合，从而产生正确的化学反应。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使用的‘原始’一词，其意义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假如最开始的资料被丢失，那么最间接的资料便发挥‘原始’的作用。”<sup>2</sup>徐先生还提出了应该遵守的次要五点，其中“第一，引用古籍时必须检得原书原文，忠实录出……不能据一家之言，妄改古书。第二，对于某史实，如果古书中所保存的有关材料具有多条”，我们的解释就应该把所有各条都叙述出来、加以分析，“并指明它们的可疑点或矛盾点，等着将来的工作人继续研究和解决。”这些方法给我们判断传世文献的真伪、鉴定传说的虚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惜的是，重量级学者并没有继续深入从而解决这些根本的问题，学界仍

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1、33页。

2 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陷于“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状态。

但徐先生这一套方法中最大的错误是关于“综合材料不可靠”“不可信”的说法，“专篇的，成系统的，大家看过可以得着一个综括印象的”“综合材料比未经系统化的材料价值低”，该“项资料写定的时期相当晚近”，并想象出一个搜集、整理和损益增删的过程，认为“多经过一次手，就多经过一次的损益增删，就更进一步地失真，并且这一次是很重要的失真”，“综合材料虽说比较失真，但是它们的写定，主要的还在先秦，属于相当的早期。它们的工作人也是搜集了不少古代的材料，并不是凭空臆造……所以较古的综合材料只要它同后一项未系统化的材料没有冲突，也还不损失它那可宝贵的价值。”因为零散资料有时候不靠综合资料很难知道把它向哪里安插。“《大戴礼记》中有关的两篇的写定，可能比战国后期更晚，但是司马迁的前几篇完全依靠它，似乎仍是战国之末的作品。”“《大戴礼记》中的两篇的综合材料虽也属先秦著作，但因为它们的特殊性质，只能同西汉人著作中所保存的有关材料同列第二等。”<sup>1</sup>所谓综合材料是否可靠，应该分析是文字、语句、文气的更改还是历史事实乃至古史结构的变动，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具体的研究。徐先生专门阐述方法“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的这部分在最早的版本中是用的“论信古”之名，上段“帝系”不可靠的看法已在其中。“帝系”编造说长期举世公认，从徐先生想当然地把五帝时代分成不连续的三个阶段，到顾先生的完全造伪，差异在可信度的有无。近年两本仍持“疑古”立场的专著也认为“帝系”是编的，但参考了许多资料，依然很有价值，“信古”与“疑古”终于在此合流。徐先生既云相当的晚近又说相当的早期，这属于自相矛盾，而以“特殊性质”之名将其降等是自

---

1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1、33页。